

红星照耀中国

第三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W. A. R. 1870

1870

1870

023/22/23

001195729

红星照耀中国



光明日报出版社

从武汉到桂林

唐士吉

撤退之前

上海、南京失陷后，国民党迁都武汉。虽然谁都知道这地方也并不牢靠，国民党当局一面高喊“保卫大武汉”，一面已将许多机关迁往重庆，但武汉三镇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群众，仍然竭尽全力为“保卫大武汉”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力量！

果然一九三八年十月中旬，日寇从南海一登陆，炮声还在千里之外，武汉的国民党大小官员便丧魂落魄，开始逃之大吉了。

随之，整个武汉呈现出一片混乱：那些满载着大箱小柜的卡车，不分昼夜地在街上为夺路而嘶鸣；官儿们为争先上船、上车的事吵闹不休；姨太太们在车上吆喝着，对骂着；码头上堆满了行李和家具；江汉关楼上的那幅巨大的“保卫大武汉”的标语，不但不能给人以鼓舞，反而成了辛辣的讽刺。

这时候，设在台儿庄路原大石洋行里的八路军办事处，却是另一幅景象。一批又一批的工人和青年学生，前来要求把他们介绍到陕北去学习，或者到八路军、新四军中去和敌人战斗。当时我在办事处电台工作，因为每天来访的人很多，电台的部分同志也参加了接待工作。完全可以看出：人们心目中的抗战中心不是什么武汉，也不是什么重庆，而是远在西北的延安；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而是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

十月二十四日，是武汉陷落的前夕。当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所谓“胜利转移”完毕的时候，八路军办事处却仍在我们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工作着。

在那些极端混乱的日子里，周副主席照常与很多人谈话，指示工作，有时外出直到深夜才回来。许多同志本来都想劝说周副主席早一点离开这即将陷落的城市，但每次见他从外面回来，总是那样神情镇定，谈笑风生，大家象是受了他的感染，反而觉得这里似乎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就暗自把话收住了。

形势越来越紧张，市内谣言四起，传说纷纭。二十四日下午新华日报社（党报机关，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一直坚持出报到临撤退的最后一天）印了最后一期报纸，发表了《告别武汉》的社论后，接着也撤退了。和新华日报社撤走的同时，办事处也撤走了一批人。这时办事处除了

周副主席和电台、机要人员以外,就只有一个警卫班了。本来在李克农同志临走之前,考虑到周副主席的安全问题,曾提议多留一些警卫人员,但被副主席拒绝了。尽管我不可能知道周副主席在忙些什么,为什么他要最后才走,但从当时的情况也可以估计出个三两分来。当时正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了纠正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有很多重要指示。根据这些指示,八路军办事处加强了组织人民武装的工作。显而易见,周副主席迟迟不走是与这事有密切联系的。

就在二十四日的黄昏,我们电台接到了一个新的联络任务。译电员在通知我们时特别传达了周副主席的指示:在天亮以前,一定要和对方联络上。时间一秒紧似一秒,远处的炮声已经隐约可闻。

我们聚精会神地守在电台跟前,搜索着天空中所有的信号,可是总找不到联络的对象。译电员同志不停地来催问:“怎么样?联络通了吗?”开始我们还能平心静气地回答他:“一定能,不慌!”后来我们也禁不住地有些恼火:“催什么?难道我们不着急吗?”译电员同志还是那样耐心地说:“老唐啊!这个对象要是联络不上,就会延迟周副主席离开武汉的时间,还要影响到武汉周围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次通报关系着周副主席的安危和革命事业的发展,便向译电员同志说:“请转告副主席,我们保证联络通!”刚说到这里,周副主席已到电台来了。

在办事处,周副主席和电台同住一层楼上,我们每天都能见到他,所以深深了解周副主席的平易近人,和工作中的一丝不苟。有一次,我们几个小伙子在楼上开玩笑,蹦蹦跳跳弄得楼梯咚咚直响。当时正好周副主席外出回来。他看看我们,也没有说什么,隔了一日把我们叫到他的房间温和地批评说:“八路军是最有教养、最有纪律的部队,怎么好在工作时间在楼上乱跑乱跳呢?”我们认错以后,副主席满意地笑了。

现在周副主席走进来,眼睛里非但没有责备的神色,就是半丝焦急的神情也没有。他围着机器,左右打量了一番,然后问道:“机子有毛病吗?”我们回答道:“没有。”他沉思了一下又说:“看急得满头汗,还不擦一擦。”接着又说:“遇到困难首先要冷静,一急办法就给急跑了。只有冷静地分析,才能找到原因。”他又问:“波长对不对?”我拿波长表量了量,小灯泡在规定的指数上亮了。这时他稍稍皱了下眉头,突然指着天线问道:“天线架得有没有问题?”

周副主席的话一下子提醒了我们。事先我们曾检查了机器的各个部分,却忽略了天线。我和摇机员忙走到室外,果然发现引线有触墙的地方。我们恨自己太粗心,赶紧重架天线。整理好天线,我打开机器重新呼叫。当我们一呼叫完,立刻听到了对方的回答。对方的声音很激动,显然他们也在急急地找我们呢!我向周副主席报告说:“副主席,通了!”他含笑地点了点头。

一份百十字的电报很快就抄完了。这时已是二十四日的二十四点。隔了几十分钟译电员又送来了一份向外发的急电。发这份电报时，周副主席一直站在机器旁边。当电报发出时，他说：“小鬼们，你们知道自己完成了一个多么重要的任务吗？”没等我们回答，副主席略带微笑地说：“蒋介石不顾抗战利益，放弃了武汉，现在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来领导武汉周围的人民起来抗日了。党中央派了一大批干部到长江流域开辟抗日根据地，刚才的电报就是和他们联系的。”听了周副主席的话，我感到一股巨大的热流灌注在周身，兴奋地望着他那明朗可亲的眼睛，久久说不出话来。

炮声越来越近，窗子都被震得颤动起来。周副主席看了看表说：“撤机子吧！现在该是我们从武汉撤退的时候了！”

武汉，我们暂时分别了。时间是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二时半。

就在我随同周副主席撤走后的三小时，日寇唾手而得地拿下了武汉。可是不久，武汉外围的群众抗日火焰，却遍地燃烧起来……

桂林街头

武汉失守以后，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经长沙到桂林时，已是一九三八年的年底了。

当时，桂林也已经慌乱起来。一天不知要拉多少次空袭警报；从粤汉线上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士兵，一群群、一伙伙，踉跄地在街上走来走去；原来的一些高大建筑，经过敌机轰炸，变成了残墙断壁；那“山水甲天下”的景色，也似乎大大褪色了。

未几，党的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同志（一九四二年在狱中被国民党害死），从延安开完扩大的六中全会回来，路过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同志，请他给全体人员作报告。因为大家都急欲知道中央对时局的分析，所以听报告的房子很早就坐满了人。我们电台的同志因其他工作晚来一步，只好挤在门边。

一开始张书记就讲起毛主席，讲起延安。我想，张书记真是抓住了我们的心理，我们是多么想念延安，想念毛主席啊！张书记谈到：“现在全国的政治中心是延安。成千上万的人，长途跋涉，通过国民党的封锁区，到延安寻求真理。桥儿沟、大边沟……办起了各种学校。延河边上、宝塔山下……到处洋溢着抗日的歌声。”我们听着听着，仿佛自己也回到了延安。接着张书记传达了毛主席在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的精神，也讲了毛主席对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的指示，对如何停止敌人进攻的分析，以及对战争长期性的估计。听完了报告，我们如同雾海孤帆发现了灯塔一样对抗战的前途豁然明朗了。

报告结束，当大家正在兴奋的时刻，李克农同志传达了办事处党委的一个决定：为了把党

中央的指示精神,把毛主席的思想迅速传开,使之深入群众,党委决定办事处立即组织一个宣传队到街头讲演、演戏。

一连几天,我们电台除了收发电报以外,所有人员都以战斗的姿态投入了街头宣传准备工作。李克农同志亲自编写了一个“坚持到底、决不妥协”的活报剧,剧中主要人物有三个:一个是悲观论者,一个是速胜论者,再一个是我们共产党人。戏中的共产党人是由周副主席的秘书童小鹏同志扮演的,其余角色全部由电台工作人员担任。我扮演的是一个自己十分不喜爱的人物——悲观论者。李克农同志还担任导演,虽然他工作很忙,但每次排戏他都到得很早。讲演组事先进行了预讲比赛,在比赛中我们电台人员因为年纪轻、记性好,还受到表扬。只有三天,一切就准备妥当。

队伍刚要化装出发的时候,计划突然改变了。在重庆出版的十二月三十日的《新华日报》空邮给我们办事处五千份。这天的报纸上登载了毛主席的报告。领导上决定让办事处人员全部出动,到街上去推销报纸。



工兵指战员扎制的第1只木筏,在泅化渡口实施强渡

我们抓紧时间把毛主席的文章读过,便分头出发了。划归我卖报的地区是火车站和城南的学校一带。由于敌机不断空袭,车站附近行人很少。我很担心手里的一百份报纸推销不出去,完不成宣传任务,便模仿汉口报童的办法,清了清嗓门,高声喊叫起来:

“看报——看报！新华日报！”

“毛泽东主席有重要文章发表！”

“看报——看报！好消息来到！”

“看报——看报！新华日报……”

哪知刚刚一喊，人们便从四面八方拥来，你争我夺，不一会儿，就抢购去一多半。为了让城南的群众也能看到我们的报纸，我赶紧夹着剩下的挤出人丛。

城南是学校区，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对于时局更加关心，没等我叫卖，便把我包围起来。无数只手臂在我的脸前、肩上和腋下伸出，人们在喊着：“我买一份！”“我买一份！”几十份报纸很快就被抢光了。我忙得满头大汗。虽然报纸已经售完，还有学生围着我，要我设法再弄些《新华日报》来。怎么办？我想其他同志也会跟我遇到的情况一样，早已将报纸卖光。忽然，我灵机一动，跑到一个土台阶上高声说道：

“同学们！大家不是都很关心时局吗？我来给大家讲讲。”

“好，欢迎欢迎！”人们拥过来。

“……今后的战争趋势会是怎么回事呢？毛泽东主席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中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坚持团结、进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算了吧！”说到这里，突然一个江浙口音的人插嘴嚷道，“日本人有洋枪、大炮，几百万国军还挡不住，靠共产党的几根矛子能打胜仗吗？”

顺着声音望去，一个穿西服戴墨镜的家伙正在奸笑着向周围的人要弄得得意的姿态。这种人我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附近就见过，到长沙也不少，如今他们又出现在桂林。他们象恶毒的幽魂一样，粘连在我们的周围和抗日群众中间。

“半腰里伸个驴嘴，胡说什么！”听众不平地骂道。

我抑制着心中的厌恶，根据毛主席报告中的主要论点严辞予以驳斥。

当我讲完话时，群众中响起一片掌声，四顾那个插嘴的人，早已不知溜向何处。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归来。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忽然一个北方口音的国民党下级军官追上来小声同我搭讪：“喂，伙计！红的吗？”我笑了笑，没有明确表示。他继续说：“没关系，我听出来了。兄弟佩服共产党。刚才你讲得太痛快了，说到当兵的心眼里了。”我和他握了握手，由衷地感到毛主席的话不但说出了亿万中国人民心里的要求，连国民党的某些下级军官也大为欢迎。我对这个军官说：“不是我口才好。我讲的都是毛泽东主席说过的话，你回去好好看看他的文章，会更加清楚。”他连连点头，说道：“呃，一定，一定……”

回到办事处时，其他同志也都卖完报纸归来，大家兴奋地讲起各启碰到的动人故事。原来大家的报纸卖得都很快，而且许多同志和我一样做了口头宣传。听完大家汇报，李克农同志接着说：“毛

主席的思想象阳光一样,照亮了桂林。咱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扩大宣传。宣传队马上出动!”

立时,演戏队、讲演组都出发了。这天的天气分外晴朗,桂林周围的群山,笑颜重开,湛湛的漓江,欢乐地荡漾着。一出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我们便齐声高歌。这歌声唤醒了慌乱已久的城市,这歌声给人们带来力量。市民们扶老携幼走上街头,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奔来,孩子们跳着、叫着在人丛中钻来钻去。活报剧取得了成功的演出效果。人们斥责悲观论者,也嘲笑速胜论者,只有童小鹏同志扮演的角色最为群众拥戴——他代表着共产党人的主张,代表着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这处演演,那处讲讲,讲演组的同志讲得是那样慷慨激昂,以至讲到动人肺腑的时候,群众也不由得跟着高呼起来:坚决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每当在一处演完、讲毕,看到群众热情洋溢的情景时,都使我激动不已。这一切,正如李克农同志说的:毛主席的思想象阳光一样,照亮了桂林,也照亮了全中国。

赶走何绍南

李仲英

开往绥德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警一团、警三团,和一二〇师的七一九团(后改为警八团),奉命开往绥德警备区,驻守河防。这是给党中央把守大门,任务十分光荣。

绥德警备区的几个县,原属陕北根据地,一九三六年红军东征抗日,被蒋介石趁机侵占。抗日统一战线达成协议后,这个地区的防务又划给了我们。但是,政权还在国民党手里,县长和政府官员都是些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货色。特别是专员何绍南,是个反共磨擦专家。据说他和侵华日军板垣师团长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两人“友情”甚笃;同时又颇得蒋介石的器重,政治上反动透顶。因此,我们临行前,上级再三交代,对他要特别留意。

部队开进绥德警备区,除一部分开赴黄河沿岸外,其余的都分赴各县发动群众。老百姓知道我们就是过去的红军,莫不欢喜若狂,奔走相告。城镇乡村,到处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当我们将党提出的彻底战胜日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政策,在群众中进行深入宣传以后,群众更是振奋,抗日热情极为高涨。

不久,“抗敌后援会绥德分会”便成立了。这是个统一战线组织,成员中有我们共产党人,有国民党人,还有当地的开明士绅。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抗日,分会主任由何绍南担任,副主任是我们警备区的司令员陈奇涵同志。几个委员当中,我们的人有袁任远等同志。我当时是司令部的参谋处长,也是委员之一。各县也都先后成立了县的“抗敌后援会”。

那时,国民党表面上跟我们保持统战关系,背地里却干着破坏抗日的勾当。何绍南当了主任以后,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调来保安队四百余名,收买了“铲共义勇队”和一群兵痞、匪徒,合编了五个保安大队,分驻各县,蓄意磨擦。于是,我们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同时,还得跟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激烈、复杂的斗争。

杨家园子事件

五月的一天,司令部接到从子长县送来的一份报告,说我们的一个连长在杨家园子村动员群众参军时,被国民党保安队打死了。我们读了报告,个个义愤填膺,立即将此情况电告留守

兵团司令部。司令部回电说：对国民党干的这种亲痛仇快的罪行，必须广为揭露，以教育人民；但大敌当前，应极力避免武装冲突。按照指示，组织上决定派我去调查此案。国民党也派第二战区政治部的一个上校特务刘科员前往。

杨家园子是个不大的村落。一进村，就见一群老百姓围着烈士的遗体小声议论。我走进人群，看到烈士的遗体，心象被刀扎一样疼痛。这颗子弹本应射向日本强盗，可是却打在忠于抗日事业的我军连长身上。我愤怒地看了一下站在一旁的刘科员。他嘴上叼着烟卷，满不在乎地踱来踱去。他们干出了这般卑鄙的勾当，还如此洋洋自得。我说：“刘先生，日本人已经闯进我们的国土，你们不积极抗日，反而杀害抗日军人，这是天理人情所不容的！”

他说：“这个结论，下得未免太早。目前有何证据，证明是我保安队干的呢？……”

话音未落，周围群众哗然，围上来讲理：

“你要狡赖，那不行，我们亲眼看到的，人证物证都有！”

“对，我们耳闻目见，你赖不掉！”

“有本事打鬼子去！”

“杀人偿命！”

在一片愤怒的吼声中，刘科员低了头。以后，我们又找到了不少证据，证实确是保安队开枪打死我军连长，阻止我军动员群众参军。在铁证面前，顽固派无法抵赖，只得认罪，并且写了协议书，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第18兵团工程大队工兵第1连，冒严寒在天心河架桥，保障部队向成都挺进

事件的结局如此,但起因却不这样简单。

杨家园子事件发生后两天,河东日寇即派大兵向我军驻守之军渡渡口进犯,企图切断我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联系。我河防部队经过激烈的战斗,击退了敌人。随底七一八团一部又渡过黄河,在老婆山伏击,消灭了二百多逃敌。

两件事连续发生,确实有些蹊跷。这时正巧我们破获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麒麟命相馆”。从敌特的口供和文件中查明,杨家园子事件,原来是何绍南制造的大阴谋。当日寇企图消灭我八路军的时候,何绍南竟想帮他的老同学一臂之力,因此不惜制造了杨家园子事件,以便削弱我河防力量,使日寇顺利渡河。这样,他就可以加我失守河防之罪,驱逐我军出境,进而公开和日寇勾结。哪知我们在上级英明领导下,打退了日寇的进犯,何绍南的无耻阴谋也被彻底粉碎。

刽子手当法官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发布了“跟制异党活动”的秘密指示,并公开叫嚣要打倒共产党,向八路军“收复失地”。何绍南更是气焰万丈,恨不得一下子把我们挤出绥德地区。杨家园子事件以后,何绍南竟迁怒于部属,把他认为磨擦无能的县长统统撤换了。在专署会议上,他又以专员的身份训斥娄罗们说:“日本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共产党。蒋委员长让大家到此地来,不是为了坐吃闲饭,而是要诸位和共产党拚个你死我活。”有人问他:“统一战线怎么办?”他大动肝火:“笨蛋,那是共产党提出来的,我们用不着!”接着何绍南的“美女队”等反动组织,更大肆活动起来,勾引我军战士逃亡,盗窃枪支、情报,张贴反动标语,暗杀我军政人员,一日数起,猖狂已极。

此外,何绍南还发动地主向农民要过去分得的土地、倒算旧租旧债,威胁群众不许和八路军接近。对顽固分子这种肆无忌惮地破坏抗日的罪恶行为,我们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于是便按党的指示,对顽固分子进行了坚决还击。我们动员农民不给地主交土地,交了的秋后连庄稼一起收回来。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对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给予镇压;对中间势力则极力加以保护。这样一来,顽固分子便逐渐孤立起来,统一战线更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了。有一次,何绍南让峦文山当请愿团长,带上几个地主,假借民意,到处拍电报,发请愿书,要求我们撤出警备区。没等我们说话,一些民主人士,就起草了真正代表民意的请愿书,电发重庆、延安和全国各地,说我们抗日有功,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不该撤离。何绍南的阴谋还是没有得逞。

几次斗争的胜利,使我军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一有什么事情,老乡们就到我们司令

部来告状。何绍南因此着急起来,便又想出了另外一套鬼计。

一天,他从胡宗南那里要了个“少将法官”的头衔,并为此大摆酒席,宴请各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何绍南装着醺醺大醉,竟奚落起陈奇涵司令员来了:“奇涵兄,兄弟我是第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现在又是少将法官。老兄你是什么衔级呢?”陈司令员听了厌恶地一笑,答道:“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不为做官。若你一定要论衔级,那末,我当过黄埔军校的教官,陈诚、胡宗南都是黄埔的学生,你说我该是什么衔级呢?”何绍南当场瞠目结舌,脸胀得象块猪肝,酒也醒了。

归途中,我们余愤未平。有的同志说:“对这些流氓就得这样。”也有的说:“想起来可笑,杀人的刽子手当法官!”陈司令员严肃地说:“有什么可笑的?国民党的法官和刽子手还不是一回事!他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瞧吧,好戏在后头哩!”

颜料案件

果然,事隔不久,我们接到了一张奇怪的状态,上面写着:

妥德警备司令部陈司令员勋鉴:

久闻八路军乃抗日之先锋,国家之中坚,全国百姓无不敬仰,边区人民个个称道,敝店人员目睹耳闻难以胜举。此心虽愚,亦深为感怀。孰料,在延川马家沟,竟有身着八路军服,手持长枪者四、五人,趁四际无人,劫去敝店颜料(计煮青五十五桶、洗蓝三十五桶),并欲杀身灭口。经敝店押货人员再三求告,始免杀身之祸。今斗胆上达贵部,望明察秋毫,严惩凶犯,以维护国法军纪。倘能人赃并获,愿以失物之半作抗日经费,聊表敝店全体人员爱国之微忱。专此呈禀,伏乞明察。

延安市 德义合 商店
进生瑞

民国廿七年八月上

我们再三看了状子,觉得其中大有文章。当然,我们的战士是不会行劫的,那么主犯是谁?目的何在?不弄个水落石出,不仅不能为民除害,而且影响我党我军的威信,不利抗日事业。我们立即四出侦察。几天以后,有人回来报告说,有个姓曹的赌鬼,以前很穷,近来终日大吃大喝,又和一家商店来往甚密,在这家商店里,发现许多颜料,和德义合、进生瑞商店失物一般无二。据了解,颜料就是从曹姓赌鬼那里买来的。我们把赌鬼逮来审讯,才知道是清涧县保安队长王玉林带着队员抢的。我们又把王玉林抓来。他供认是奉县长艾善甫之命,冒充八路军到

外县抢劫的。至此,事情真相大白。反动派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企图嫁祸于我,制造舆论,迫使我军撤出这个地区。

我们决定找艾善甫算账。立即以司令部的名义,向何绍南说明艾善甫的罪状,要他交人到案。谁知何绍南耍了一个花招,请袁任远同志和我去开会。

去,还是不去呢?大家纷纷议论。有的说:“明摆着是个圈套,去了凶多吉少!”也有的说:“我们有枪杆子,量他不敢有过分的行动!”后来,党委会研究决定:去,和他面对面斗争,但也不能疏忽大意。

何绍南的办公地点离城一里多路。我们一出城,就感到风声不对,沿途哨兵密布,个个全副武装,满面杀气。老袁和我互相望望,都轻蔑地笑了,心想:真理和正义在我们这边,摆这个阵势吓唬谁呢?我们带着三个警卫员,若无其事向前走去。

何绍南门口的哨兵也比以往增加了一倍。进了客厅,我们便紧挨何绍南坐下,没事便罢,一旦有事,第一个倒霉的就是他。



灌注混凝土

开会了,先谈了些别的事情。老半天,何绍南才拐弯抹角地转到颜料案件上。他要求把犯

人移交给他,由他来审处。他是急不可待了,怕日子一久,犯人供出他是此案的老根。他越急,我们越沉着。袁任远同志慢条斯理地说:

“提起这个案子,艾善甫是主犯,我倒要请何先生协助,交出人来,以便完案!”

何绍南象吃了辣椒,鼻尖沁出汗来,说:“兄弟是专员,又是少将法官,还是在这里审理为宜。”

说到法官,我们把话接过来:“何先生既是法官,就该熟知法律。这案子是军人干的,应受军法制裁,因此须由我们警备司令部处理。再说,人家告到我们那里,没有特殊情况,是不该转手的。这在《六法全书》中有明文规定。”

他听到《六法全书》有点傻眼,问身旁一位法官,那人点头称是。恰好我备有一本袖珍《六法全书》带在身上,当场掏出说:

“这是国民政府公布的。何先生若有怀疑,可以看看!”

他没有接书,脸红得象猴屁股,半晌才说:“不必了。其实在哪里审理全是一样。依兄弟之见,这里方便,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是啊,你们是一窝子土匪!”我心里这样想着,不觉笑出声来。他见我冷笑,狗脸一变,蛮横地要我们交出在押的有关人员来。我们当然也不示弱,要他交出艾善甫。他说:“那是我的县长,怎能交给你们!”

袁任远同志严厉地说:“什么县长,是土匪!‘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他既犯法,就该严办,以平民愤,澄清事件真相,挽回我八路军的声誉。”

争论许久,没个结果。最后几个民主人士站起来说,会议时间太长了,以后另议吧。何绍南自知理屈,只好不欢而散。

出得门来,几个民主人士对我们说:“怕你们来,你们偏来,好叫人担心。”我们说:“我们有部队,谅他不敢怎样!”

纸里包不住火,何绍南及其爪牙干的无耻勾当,大白于天下,群情激愤,纷纷要求惩办凶手。何绍南见事不好,把艾善甫当个替身,押到街上游街示众。人们指着艾善甫的鼻子大骂:“国民党县长就是土匪!”还有人喊口号:“打倒贪官污吏!”

颜料案件的结果,和顽固派的愿望恰恰相反,广大人民和民主人士更加靠拢我们,而何绍南日益孤立。

如此结局

不几天,我们又在一座山上发现一百多土匪,到处打家劫舍,扰害人民。侦察得知,匪首是

折可轩。折可轩是何绍南的保安队长，一员得力的大将，如今忽然当上土匪，其中定有阴谋。我们找何绍南质问：

“何先生，据说你的部下当了土匪？”

他听了泰然自若，张一张手说：“老兄此话从何谈起？兄弟不懂。”

“折可轩是你的部属，如今他当了土匪，难道你竟一点不知道？”

“这是真的？”他跺了跺脚，装着深恶痛绝的样子，“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可惜我栽培他的一片心血付诸流水了。”

看着他那副无耻嘴脸，我们肺都要气炸了。看来和他多说也没用，只有按计划行事。我们说：“既然何先生也这样痛恨，我们坚决平息匪患，为民除害！”

他一听慌了，但当着我们的面，不得不假装镇静地说：“兄弟欢迎，一定派人协助！”

我们告诉他不必派人，但他还是死皮赖脸地说：“不能抽出武装，已深感不安，派一人相助，请万勿拒绝。”

部队临出发时，那个人来了，原来还是上次调查杨家园子事件的上校刘科员。对他，我们自然格外小心。

战士们都是轻装打扮，沿着大路向前进。深秋时节，天高气爽，气候宜人。金黄色的庄稼漫无边际。农民们在田间收割，匆忙中带着一点恐慌。我边走边想：这样富饶的土地，这样勤劳的人民，如果没有内患之忧，团结一致抗日，是何等强大的力量啊！可是，万恶的顽固派却千方百计地制造磨擦事件，分裂抗日阵线……

“李处长！”刘科员象讨厌的苍蝇紧挨着我并辔而行，忽然说：“贵军作战勇敢，指挥灵活，可否请教这次如何打法？”

我知道他是套情况，不由冷笑着回答：“八路军从不打主观主义的仗，怎么打，要看当时情况而定！”一句话，把他的嘴封住了。

晚上，到达目的地。部队连夜运动，拂晓前完成了包围。一转眼，那个“刘科员”不见了，找遍各处，也没有他的影子。不久，跑来一位老乡，向我们说：“土匪都在山上。匪首折可轩不在，跑到老君殿和一个人谈话去了！”我问那个人的模样和装束，老乡描述一番，正是“刘科员”。原来他给折可轩通风报信去了。我马上派人去抓。

下午，折可轩在逃跑的路上被我们活捉，押解途中，被受害的老乡们打死了。

天黑时我们向山上发起进攻。失去首领的一帮乌合之众，哪堪一击，刚一接触，有的投降，有的逃散，几十分钟就结束了战斗。这时，我们身后忽然响起了枪声。原来是何绍南的保安队过来了。出发时，他还说抽不出武装，现在却来抄我们的后路，分明又是一条毒计，企图和土匪夹击我们。不过这次和过去一样，何绍南又枉费心机了。土匪已经被消灭，我们没有后顾之

忧,转过头来就向保安队猛冲猛打。保安队长吃了亏,赶紧讨饶,说是协助剿匪,发生了误会。谁信他的鬼话!不过,他既讨饶认错,我们也就罢了。

何绍南一系列的罪恶活动,引起广大群众极度愤慨,纷纷起来揭发控告。我们将事实电呈留守处主任肖劲光同志,肖劲光同志当即将我们的报告转给蒋介石、胡宗南,要求撤换何绍南。但结果是石沉大海,杳无回音。就在这时,何绍南又纠集了十三个保安队公开向我军发动武装进攻。我三五九旅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立即展开反击,将保安队大部歼灭。磨擦”专家何绍南就此带着少数随从,夹着尾巴逃出了绥德警备区。

我们迅速恢复了城镇和乡村的社会秩序,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按三三制原则,建立了民主政权。至此,绥德警备区面貌一新,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它为党中央守住了大门,保证了党中央与华北、华中和华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联系。